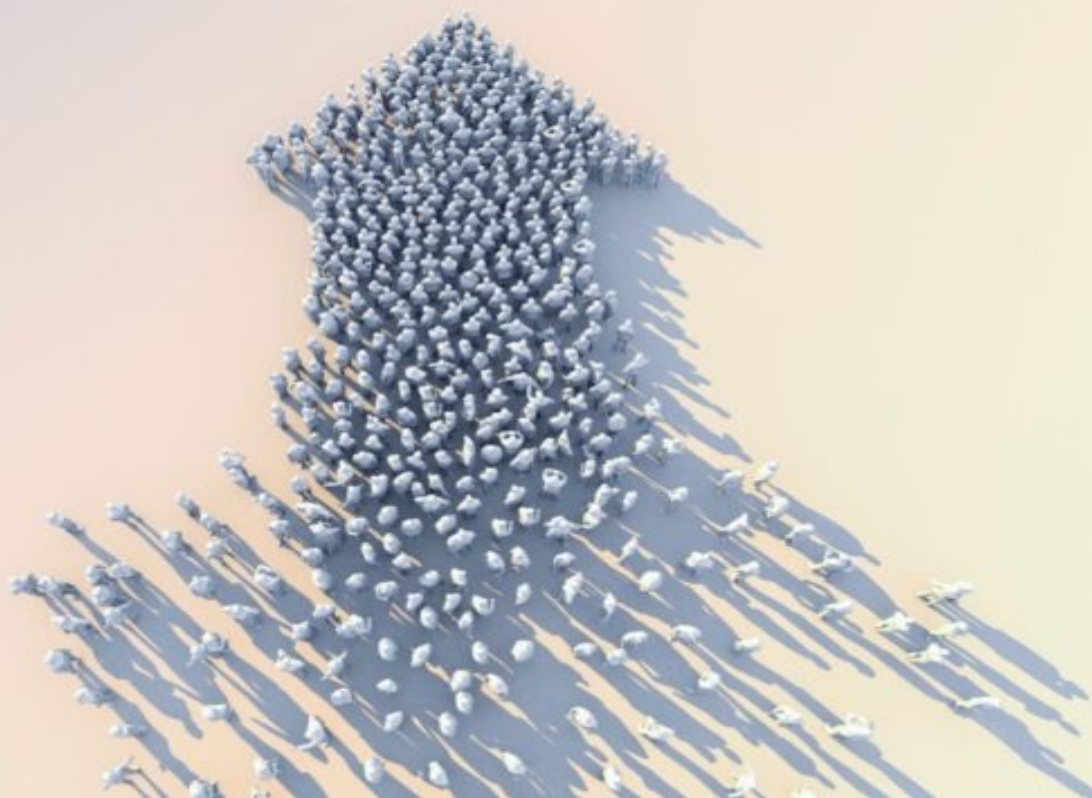




GESELLSCHAFT FÜR DEUTSCHE  
PROFESSOREN CHINESISCHER  
HERKUNFT E.V.

# 德国华人教授学会通讯

2022年12月第二期



# 目录

## ■ 编者的话

---

编者的话 ----- 韦乃铭 2

## ■ 专题 - 中国能力

---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中国周系列活动 - 德国山城的中国元素 ----- 侯正猛 3

透过德国的“中国能力”项目浅谈中德交往中“文化智商”的重要性 -- 唐敏 7

## ■ 学会动态

---

会员发展情况更新和学会2022年年会 ----- 彭建, 韦乃铭 14

## ■ 学苑

---

我的汉学生涯 ----- 杨治宜 17

## ■ 专访

---

人生的意义在路上 - 采访刘晴教授 ----- 丁永健, 刘晴 24

## ■ 杂文·随笔

---

读书笔记 - 《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外交政策》 -- 孟立秋 30

亲爱的各位同仁，

2022，水虎年，毫无疑问是一个多事之秋。我们经历了俄乌战争的爆发和延续，由此造成欧洲目前的能源危机和社会动荡，上海及中国其他城市在全世界各地已经逐步开放的情况下实行动态清零政策及封城措施，最近由乌鲁木齐火灾而引发了中国防疫政策松动...。如果我们回顾历史，这些事件都会对将来世界秩序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在这个月，德国语言协会选择了“Zeitenwende”（时代转折点）一词作为2022年的年度词汇。

我们的德国华人教授学会，在经历了两年的网上会议之后，今年的学会年会终于在今年7月23号和24号在埃森以现场形式举行，久违不见的同仁和朋友终于又可以聚在一起畅谈交流。这次年会以“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为主题，组织了两场论坛活动。会议上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热烈。但是会议时间有限，颇有言犹未尽的感觉。所以我们将“中国能力”作为本期《德国华人教授学会通讯》的主题，由正猛和唐敏两位同仁和大家进一步地分享他们的经验和体会。正猛带领的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中国能力中心能在当下中德意识形态对立加剧的大环境下非常成功地主办以交流合作为主旋律的第五届中国周活动，实属不易。唐敏在对她以往工作的反思中用“文化智商”的模式来诠释什么才是“国际交往能力”的真正内涵，哪里是在建设“德国的中国能力”或者“中国的德国能力”过程中的误区。

学会通讯第一期的人物采访文章，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兴趣。我也收到了一些读者的珍贵的反馈意见，其中有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到年轻同仁的成长道路。这一期我们将这个采访80后同仁的任务交给了永建兄。永建兄不负重望，他对汉堡大学刘晴同仁的采访，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不拘一格精彩故事。

在上一期的学苑专栏，我们特地选择了介绍一个人文科学专业，给我们学会这些以理工男和理工女为主流的会员做一个视野的拓展。在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任教的治宜同仁在她的文章中以她独特的风格给我们介绍了她的从宋代古典诗歌到当下数码时代的汉学研究生涯，还深入浅出地解释了汉学、国学、中国学和汉语语系研究的区别。

很多同仁都知道，立秋爱读那些与她专业无关的“杂书”。她的读书爱好，也让各位同仁受益匪浅，因为她将她的读书笔记发到学会的微信群上，和大家一起分享她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感想和体悟。每能读到她的深刻见解，我都心怀感激。作为这期通讯的结尾，我将立秋读Joseph S. Nye所著《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外交政策》的笔记编辑之后，再给大家阅读。笔记中无论是关于价值观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权衡的思考，还是“囚犯困境”迭代游戏实验结果的启示都给我们如何理解和应对当今这个正处于Zeitenwende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智慧的视角。欢迎大家对此的发表感想和评论，无论是直接发到学会的微信群里，还是在下一期的学会通讯中撰文和大家分享。

我衷心希望学会通讯能发展成我们会员之间信息和思想交流的家園。最后，在2022 / 2023年的辞旧迎新之际祝各位同仁安康愉快，顺利吉祥！

韦乃铭  
2022年12月18日

##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中国周系列活动 — 德国山城的中国元素

侯正猛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TUC）中国能力中心是德国科教部（BMBF）于2017年启动的在德国高校培养“中国能力”战略入选的11个项目之一。该中心的最大亮点是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周系列活动，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中国周的宗旨是通过邀请来自中德两国的政府代表、高校专家、企业及文化各界人士围绕着中德两国政治、科技、经贸、教育和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交流，以此增进双方了解，促进中德友谊、互信，并探讨两国合作新机遇，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发展。同时，也为两国的学者和青年学子提供新的交流渠道，架起沟通两国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中国周活动自举办以来，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深受中德各界人士的好评。中国的人民网、新华网、欧洲时报、科技日报等知名媒体竞相报道，其影响力不断扩大。克大中国能力中心也将听取各方建议，通过不断的



2018年10月22号第一届中国周：中国能力中心揭牌仪式。揭牌嘉宾（从左到右）：TUC副校长Wolfgang Pfau教授，TUC副校长Alfons Esderts教授，TUC中国能力中心负责人侯正猛教授，TUC校长Thomas Hanschke教授。

学习，更加精心的策划和准备，努力把中国周系列活动办成精品活动，致力于为中德各界提供更多拓宽国际视野的机会，为中德教育、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 2022年第五届中国周活动介绍

2022年11月7日到11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周系列活动，在经历了两年的线上活动后，迎来了线上+线下的全新模式。疫情期

间三届活动汇聚了中德政商界代表和知名学者。其中政界代表包括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前部长万钢教授，

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处公参黄伟先生，中国驻德使馆科技处公参陈霖豪先生，中国驻汉堡总领事馆时任总领事杜晓辉先生等。德国政界方面有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基社盟党)、前联邦副议长、德国联邦议院德中关系小组主席Hans-Peter Friedrich博士，德国联邦科教部前部长、中德对话论坛德方主席沙万女士(Annette Schavan)，下萨克森州科教和文化部时任部长Björn Thümler先生和下萨克森州科教和文化部时任国务秘书Sabine Johannsen女士等。工商届代表有大众集团CEO Oliver Blume先生，华为德国柏林办公室首席代表王承东先生和三一重工驻普茨迈斯特公司代表蒋向阳博士等。学术届代表有德国 DAAD 主席 Joybrato Mukherjee教授，德国工程院雷宪章院士，帕德博恩大学校长 Birgitt

Riegra 教授，不伦瑞克工业大学校长 Angela Ittel教授以及来自中国的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刘炯天院士、校长李蓬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校长徐惠彬院士和安徽大学党委书记蔡敬民教授等。

本届中国周活动的内容聚焦于当前复杂国际关系背景下的中德合作，重点围绕疫情和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关系、能源转型与能源危机和中德高校合作等议题进行了40多场报告和3场圆桌论坛。此外，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中国能力中心还组织参观德国企业，烹饪中国传统美食以及放映中国国产电影等活动，深入扩大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推动新时期中德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 2022年中国周具体安排的主题活动有：

- |        |                           |
|--------|---------------------------|
| 11月7日  | 周一：学生日                    |
| 11月8日  | 周二：中国周正式开幕日—全球挑战背景下中德大学合作 |
| 11月9日  | 周三：俄乌战争和疫情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关系      |
| 11月10日 | 周四：欧中论坛：俄乌战争背景下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危机 |
| 11月11日 | 周五：中国-下萨克森大学合作研讨会         |

中国周正式开幕的前一天11月7日为学生日，重点是讨论到中国的各种留学和交流途径，并听取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黄伟公参关于留华途径和资助，TUC中国能力中心负责的交换项目概况以及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的合作办学经验等6个精彩报告。传统上，学生日还提供了参加气功“试听

课”和颇受欢迎的有奖知识竞赛。这一天以烹饪亮点结束：近40名与会嘉宾共同制作和品尝中国饺子以及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简短讲座。大家兴高采烈交流和激烈讨论，气氛如此之好直到晚上10点才慢慢散去。



2022年中国周的国际经济关系圆桌论坛：现场嘉宾（从左到右）：论坛主持人TUC代理校长Heike Schenk-Mathes教授，埃森大学汉学家Thomas Heberer教授，图宾根大学汉学家Helwig Schmidt-Glintzer教授。线上嘉宾（从左到右）：IWC中德经济与技术合作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周向前博士，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基社盟党）、前联邦副议长Hans-Peter Friedrich博士，蔚来集团副总裁张晖先生

在11月8日举行的中国周开幕日上，在万钢教授和沙文女士等中德各位嘉宾致辞，以及郑州大学校长李蓬院士、不伦瑞克大学校长安杰拉·伊特尔教授、中国驻德大使馆科技处陈霖豪公参等主旨演讲后，中国周活动的发起人侯正猛教授主持了“全球挑战背景下中德大学合作”圆桌论坛。与会者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中德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应当进一步扩大和促进。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访华之旅进一步说明，合作对于德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未来的合作也许会出现更多的挑战，因此，去差异化的合作应该更受重视。

11月9日的会议聚焦俄乌战争和疫情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关系这一当今备受关注的题目，由TUC代理校长Heike Schenk-Mathes教授主持。在德国联邦议院德中关

系小组主席Hans-Peter Friedrich博士和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Oliver Blume博士致辞后，来自中德学术届和企业届的6位报告人做了精彩的报告。在接下来的圆桌论坛中，与会者认为，中德的经济关系相互依赖，在合作和竞争中，即要看到双方有差别，也要看到共同之处。双方都不应该制定一些没有必要的条条框框来限制思想和新知识的交流，而需要更多人际之间以开放、诚实和信任为基础的对等沟通，以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对方的运作过程和机制，否则你将面临孤立自己的风险。俄乌战争背景下的能源转型与能源危机的欧中研讨会于11月10日举行，由下萨克森州能源研究中心Knut Kappenberg博士主持。6场精彩的报告和接下来的圆桌论坛吸引3600余名线上观众的参与和讨论，热烈程度远远

超出了最好的预期。当天的结论是：我们迫切需要能源转型，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目前由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固然是个重大挑战，但同时也对能源转型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是每个国家都拥有煤炭、石油或天然气资源，但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太阳能、风能、水能和地热能。尽管欧洲要克服目前的能源危机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但目前的困境肯定不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局面。

2022年中国周于11月11号以传统的中国-下萨克森州大学合作研讨会谢幕。本次研讨会由下萨克森州科教和文化部的中国事务专员Thomas Hanschke 教授主持。当天最受线上线下与会者欢迎和赞扬的是汉诺威大学数学教授Michael H. Breitner关于中国、

德国和世界社会规范、伦理以及道德的演讲，线上参会的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丁永健教授特别欣赏他对世界的“非欧洲中心观”并称赞他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包容比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好。我们注意到，今天的德国社会各界不乏对中国过度依赖的批评声音。与会者认为，这种批评声音主要是因为两国政府和制度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因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为此，双方的相互了解不应仅限于文化和语言，还应该了解彼此的体制框架和政治结构，更要理解对方、确定双赢领域和容忍不同观点，这样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伙伴关系。

## 2022年第五届中国周总结

在这次为期一周的活动中，与会的中德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合作须优先于竞争。因为无论中国还是德国，显然都无法单独克服全球性的挑战，我们应当消除分歧来共同寻找解决方案。未来，双方应更加重视气候变化、碳中和与医疗健康领域的合作研究。同时，中德之间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和促进青年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总而言之，中德合作，无论是教育、经济、技术还是学术方面只能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进行。目前中德之间不仅需要开展坦诚和互信的对话，也需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这样你不仅可以赢得战略合作

伙伴，还可以赢得朋友。最值得向中国学习的是果断、灵活、勤奋和务实。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归根结底，中国周之所以如此顺利并获得持续的积极反馈，离不开德国科教部BMBF对全德国11个中国能力中心的资助，当然还有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再次感谢各位！

本着“这场比赛的结束就是下场比赛的开始”的座右铭，我们不想为今年中国周取得的成绩而“吃老本”，而是现在就诚挚地邀请您参加即将到来的2023年中国周！

## 透过德国的“中国能力”项目浅谈中德交往中“文化智商”培养的重要性

德国管理应用技术大学创造力与创新研究院 唐敏

德国教育和科技部（BMBF）于2017年启动了在德国高校培养“中国能力”的项目。我校有幸承担了这个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从2018年10月至2022年9月底，我们成功完成了一次“创新中国”的探究之旅，举办了15场中德创新论坛，其中8次和中国文化活动相结合，辅导了十余篇关于创新中国、中德创新合作或中德比较研究的论文，

并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经济中的创新与创造：德中合作的基础、经验和见解》的合著（Springer出版社）。下面我就这个项目的背景、内容、和成果给大家做个汇报，并分享一下我个人关于德国的“中国能力”，中国的“德国能力”以及“文化智商”培养方面的一些个人体会。

### 德国的“中国能力”项目的背景

中德建交以来的五十年，在经贸、科研、教育及文化等领域展开了密切合作，成果丰硕。经贸方面，中德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不到3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2351亿美元，中国连续6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连续47年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两国产业链供应链和民间交往深度融合，友好省州和城市已达103对。文教方面，两国青年对彼此语言和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中国有150余所高校开设德语专业，德国有超过3万人学习中文。目前

在德国有5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

在同中国的密切交往中，德方认识到，中国的合作伙伴对德国的政府制度、社会和文化往往有深入的认识，并常常具备出色的语言能力。与之相比，德国方面对中国

的了解比较欠缺。为了纠正这种不匹配，2017年，BMBF、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MK）与外交部（AA）委托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开展了关于德国的“中国能力”现状的调查。当年底BMBF启动了在德国高校培养“中国能力”的项目倡议。这一倡议引起了德国教育界的极大兴趣。从80多个项目申请中，BMBF总共选出了11个项目，每个项目都获得德国政府数年的资助。我校的“创新中国”（CHINATIV）有幸成为入选的11个项目之一。在地理位置方面，这11个项目覆盖了德国东西南北的7个不同的州。学科方向方面，项目覆盖了工程、技术、能源、法律、经济与管理学以及自然与生命科学等不同学科，使得项目在所在的州和学科能够起到“灯塔”作用，并



并在地理位置和培养对象方面做到互补。值得一提的是，11项目中除了我所负责的CHINATIV项目之外，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的侯正猛教授所负责的TUC China项目也在此列。

2018年5月，在BMBF主办的“德国的中国能力”的专家会议上，MERIGS的国内政策研究项目主任Matthias Stepan做了《掌握中

国知识，运用中国能力——在德国拓展中国能力的起点》的报告，证实了德国的中小学和大学在“中国能力”建设方面的不足，敦促联邦政府加大投入和支持力

所资助的所有11所高校的中国能力项目的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通过海报的形式展示了各自的项目进展。

## CHINATIV项目的定位、方法和主要成果

过去的十年，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发展有目共睹。这一发展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上的排名。2013年，中国在此榜单上的排名为第35位。而这一排名在过去的10年间稳步上升，已达到了目前的第11位。德国在此榜单上的排名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属于前十的位置。这一结果显示，新时期，中德两国都将创新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中德两国不论在历史、文化、思维还是政治、社会、体制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都选择了创新强国之路。这意味着，中德两国不仅仅是竞争对手，更是探索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创新解决方案的重要战略伙伴。因此，我们把我们的中国能力项目的重点放到了“创新”和“创新管理”上。项目的名称CHINATIV也由此而来，即“CHINATIV – Kreativ und Innovativ: Ein interdisziplinärer Ansatz zur Entwicklung von China-Kompetenzen mit Fokus auf Innovations-management”（中文翻译：CHINATIV——创造力与创新：通过跨学科

合作提升以创新管理为核心的中国能力）。

2011年，BMBF和中国科技部共同创建了“德中创新平台”（Deutsch-Chinesische Plattform Innovation - DCPI）。该论坛主要从政策、制度与技术的宏观层面对中德创新进行探究和交流。CHINATIV力图从微观层面对该平台进行一个补充。项目汇集了文化、心理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以及艺术与媒体四个不同领域的专家，从微观层面挖掘创造力与创新的文化与心理学机制，致力于比较德国和中国的创造力与创新的理念、动机与方法，以促进中德创造力与创新的研究者、中德两国学界和企业界人士，以及未来创造力与创新的践行者通过比较、交流与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在方法上，CHINATIV在项目运行中始终贯彻三大原则。

**第一，“文化切入、论坛深化”的活动特色。**在德国关于中国的论坛和文化活动很

多，但大都是把两者分离开的。论坛就是论坛，请一群专家或学者就一个主题做报告，进行讨论。文化活动就是文化活动，组织一群在德国的中国艺术家或艺术业余爱好者吹拉弹唱，书法、剪纸、茶艺等齐上阵，内容丰富、场面热闹。但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很少，仿佛论坛结合了文化活动，就缺乏深度。而文化活动中多了论坛，似乎就太教条，不接地气了。但我们认为，“中国能力”的培养既需要对中国文化有直接的感性认识，又需要通过论坛的形式对感性认识进行分析和深化，把其提升到理性认知的层面。因此，我们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始终贯彻“文化切入、论坛深化”的原则。比方说，春节到了，我们邀请中德专家齐聚一堂，交流中德在创新领域合作的心得和体会。之后，我们步入贴有春联、窗花，摆有茶艺、麻将的“文化角”，品茶、搓麻将、欣赏中国民乐。然后，中德参会人员把袖子一卷，团队作业，动手包饺子。双十一“光棍节”到了，我们请来阿里巴巴的高管给大家讲“光棍节”的由来，并同我们分享阿里巴巴当年电子销售的策略和业绩。之后，中德专家上阵，围绕“数字化和电子商务”做报告，进行交流。CHINATIV这一独特的“Forum(论坛) + Event(文化活动)”的活动特色，受到了参会人员的一直好评。

**第二、中德对话的对等交流模式，而非“单方面地谈论对方”，即德语所说的，“Reden mit einander, nicht über einander”。**这一方法的由来主要是基于我们对已有的中德交流模式的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

中，一直是以一种学习者的身份在参与。不论是在国内参加有外国专家参加的活动，还是在国外进行考察访问，中国的学者和企业界人士习惯了认真地倾听和做笔记，而不是与合作伙伴在一个层面进行交流和沟通。而国外的合作伙伴似乎也习惯了以“师傅”的姿态发表见解、“指点江山”，而不是一种“对等交流”(Kommunikation auf Augenhöhe)。这种不对等的交流模式不利于对话双方的深层了解，难以达到“双赢”的效果。但要改变这种交流模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

首先，语言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障碍。即使在德国，要找到有业务专长，同时又能用一口流利的德语和德国同行进行“对等交流”的中国专家其实并不容易。如果在中国找专家，能说德语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尽管大部分中国专家都能说点儿英语，但也不是每个专家能说一口流利的，能让德国同行听得懂的英语。德国方面，大多数专家通过英语交流是没有问题的，但目前能说中文的德国人少之又少。语言的问题纠缠了我们很长时间。有人建议在德国搞论坛尽量用德语交流的；有人认为德语英语都可以，也有建议中德双方用自己的母语，通过同声传译交流的。以上三种方式我们在组织论坛的时候都使用过了，但评估的结果发现，没有哪个方式更好。被我们寄予厚望的同传，也因同传人员水平的差异，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不用说同传的费用确实太高。总之，在语言问题上，中德双方都需要努力。中方特别需要提高英文的口头表达能力，如能说好德

语更好。德国方面，除了德国高校的“中国能力”项目外，BMBF也在推进中小学的“中国能力”建设，特别是汉语教学。近几年我遇到过两三个中文说得非常流利，甚至没有口音的德国年轻人，他们都是中小学就开始学习中文，并曾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看到德国新生代对这一瓶颈的突破，甚是欣慰。

除了语言外，对话双方的心理素质和实力之差异也是影响能否真正实现对等交流的关键因素。如任何一方缺乏自信或盲目自信都会给交流带来很大的障碍。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第三章有详细阐述。

**第三、基于“第一手资料”的直接体验和科学探究的学习方法。**今年7月底，在学会的年会上，Heberer教授强调，要想了解中国就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与我们项目的基于“第一手资料”的原则不谋而合。CHINATIV以创造力和创新为切入点，确立了中德创新合作、技术创新、商业创新、教育创新、社会创新以及绿色创新六大主题（见图1）。2019年初项目启动后不久，我们就选拔了本校12名来自商业心理学和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然后在国内合作院校也选拔了12名有相似学科背景的学生，给他们一一配对。配对的学生围绕项目的六大主题，通过C3的方法，即Collaborate（合作），Compare（比较），Co-Create（共创）进行学习与交流，共同构建关于中德创造力与创新的认知体系。这样远程的学习和交流持续了五个月。

2019年5月底德方的12名学生在6名导师的陪同下远赴中国，在西安、珠海和深

圳三地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创新中国”的探究之旅。之前通过网络交流学习的中德学伴们此时第一次见面，给我们介绍他们的科研项目的进展，并通过实地调查、企业参观等方式，收集关于“创新中国”的第一手案例和资料。按照原本的计划，中德双方将于2020年再次见面，报告调研结果。可惜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我们的第二次中国之旅一直到今年9月项目结题时仍未能成行

值得欣慰的是，12个德国学生中的9个坚持完成了自己的调研，并将成果发表在了我们名为《中国经济中的创新与创造：德中合作的基础、经验和见解》的书里，（Springer2021年9月出版）。该书共19个章节，分别介绍和分析中国经济中诸如数字化、电子商务、绿色创新、“中国制造2025”以及“一带一路”等创新举措。参与该书写作的共28名学者和学生。这是一本抛砖引玉的书，中德学者和学生们的参与使得我们能够从中国与德国、科学与实践、传统与现代以及不同世代的多角度分析和解读“创新中国”。

### CHINATIV的方法、主题与目标



图1. CHINATIV项目的方法、主题与目标  
 图片来源：德国管理应用技术大学CHINATIV项目)

### “文化智商” 对中德对话的对等交流模式之重要性

要建立如前文所提的中德对话的对等交流模式，需要有对话双方互信的基础。如果只有单方面的意愿，即使再努力、投入再大，也实现不了对等交流。为此，双方都需要客观、冷静地审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积极地提升自己的“文化智商”。

“文化智商”（CQ; Cultural Intelligence）是2003年，由Earley和Ang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新概念，指的是个人在文化多样化的环境中灵活而有效地运作和管理的能力。如图2所示，文化智商是个包括认知（Knowledge）、动机（Motivation）、元认知（Meta-Cognition）和

行为（Behaviour）的多维度的概念。认知维度指的是了解不同文化的异同，以及由异同产生的影响。动机维度指的是在多文化环境中愿意了解并积极应对不同文化的驱动力。元认知维度指的是对跨文化情境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识，以及利用这种意识有效地管理这些情境的能力。行为维度指的是在多文化情景中有效应对和适应的能力。

## Cultural Intelligence (CQ) Frame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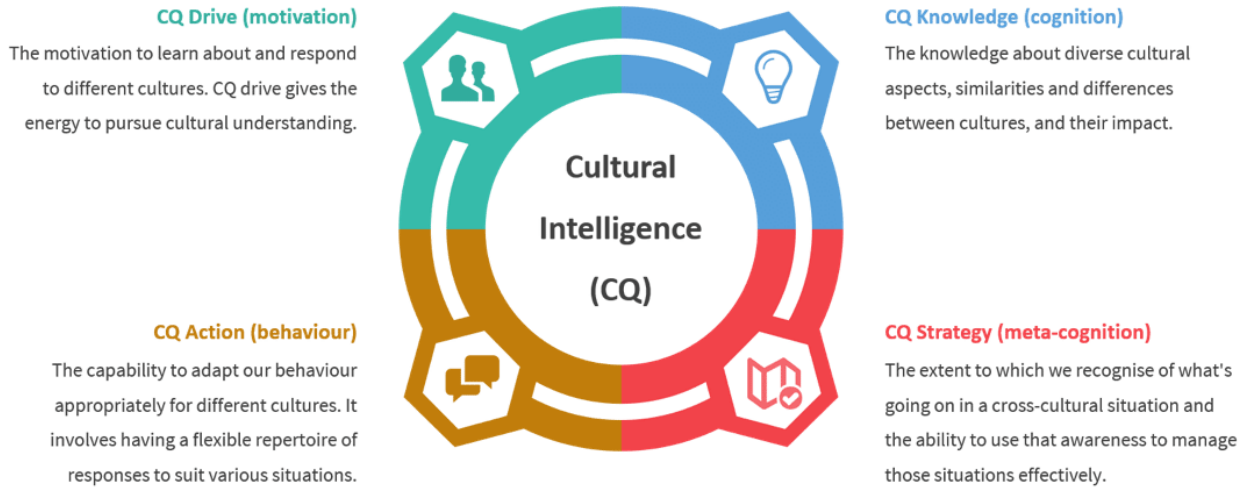


图2. “文化智商”的理论框架

在跨文化交际中，许多人认为只要学好外语，多出国跑跑，接触了解一下异国文化，就是高文化智商的表现了。其实不然，因为这只是文化智商的“认知”的单维度，而非多维度。简单地说，文化智商既包括对自己和异国文化现象的认知，也包括对自己和对方参与国际交往的动机的理解。同时，需要对自己跨文化认知的过程进行反思和监控（即所谓的元认知），并付诸跨文化交际的行动。

我从事跨文化交流和研究工作多年，发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德国，在跨文化交际的教学和培训中都一味强调认知和行为的层面，而忽略了动机和反思的层面。在交流中，我们只有既了解自己的动机，又了解对方的动机，才能更好地融合差异、求同存异。如果在此过程中，我们能有反思和监控自己行为举止的意识，那学习会有收效，跨国交流的效果也会更好。

说到跨文化交流中的反思和监控，就不得不谈一下“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问题。“民族中心主义”认为自身的族群和文化优越于其它的族群和文化，从而轻视其它的族群和文化，并用自己文化的标准去审视和要求其它的文化。跨国管理中最经典的理论就是我们要摒弃“民族中心主义”。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人的思维和行为都受到自己文化的影响和约束，要摆脱自己文化的影响，完全客观、理性、不偏不倚地去接纳其它文化，尤其是在价值观层面和自己的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文化是非常有难度的。因此，启动元认知，有意识地反思和监控“民族中心主义”在跨国交际中的影响，对跨国交流和合作的成败至关重要。

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每年进行的不同国家的民众对不同国家的评价之调查为列：在新冠前2019年的调查中，德国34%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偏正面的评价，56%有偏负面的评价。2022年春季皮尤进行的同一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0%的德国受访民众对中国持正面评价，高达74%的受访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的看法。我们应该如何从“文化智商”的角度去反思和诠释这一调查结果？

一方面，我们知道皮尤研究中心是一家独立、无党派和非盈利性质的民调机构，并在调查中力图做到客观和公正。由此，它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它是一家美国的机构，从而无法完全摆脱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这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调查方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再加上西方媒体对调查结果的选择性解读报道，从而塑造出更加不利于中国形象的舆论态势。因此，一些国内媒体对该调查的结果以谨慎和批评的态度进行解读也是无可厚非的。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来反思这件事：该研究所显示的新冠前后德国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印象的大滑坡非常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德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上升？仅是文化隔阂和价值观的差异，还是我们的行为确实有让德国的思维方式难以理解的地方？这些细节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主动建立起对等交流机制，澄清事实、消除误会？只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应用“文化智商”的方法反思和审查自己的动机、行为和举止，才能以积极的心态和行动去

建设性地应对国际交往中的误解、偏见与冲突。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兴起，很多中国同胞一下子从之前的缺乏自信、妄自菲薄走到了盲目自信、妄自尊大的另一个极端。因此，在我们谈“德国能力”的同时，也应该重视中国的“德国能力”的进一步构建。德国尚能意识到自己缺乏“中国能力”，并投入资金、人力大力发展德国的“中国能力”。中国是否也能客观冷静地审视自己的不足，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德国能力”、“国际交往能力”和“文化智商”？

令人欣慰的是，中德教育界的专家们已经意识到中德交流中对自己跨国交际能力以及“文化智商”提升的重要性，并在进行积极的对话和沟通。只要我们双方共同努力，就一定能为中德对等交流的“双行道”注入能量和活力，对中德关系持续而深入的发展发挥作用。

## 会员发展最新情况和2022年德国华人教授学会年会

彭建, 韦乃铭

### 会员发展最新情况:

自第一次会刊发布以来, 学会至2022年11月底学会止又迎来了**12**名新会员 (男**6**名, 女**6**名)。新来的会员中, 约一半是45岁以下的青年教授。在学科分布上, 90%新会员属于理工类专业, 主要来自工程学,

信息及自然科学。一位教授属于人文社科专业。在学校分布上, 8位来自综合性大学 (包括1位荣誉教授), 3位来自应用科技大学。以下是新会员的具体信息:

Title	姓名	大学	研究领域
Frau Prof. Dr.	黄菲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History and Society of China
Frau Prof. Dr.	卢梦	University of Bayreuth	Environmental Research
Prof. Dr.	刘鹏飞	RWTH Aachen University	Civil Engineering
Frau Prof. Dr.	张萍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Kaiserslautern	Automation Engineering
Prof. Dr.	刘祥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ildau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
Prof. Dr.	涂鸿浩	Dresd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rrelated Electrons and Topology
Prof. Dr.	葛茂荣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 / GFZ	Real-time positioning and multi-sensor navigation
Frau Prof. Dr.	闫慧荣	University of Potsdam / DESY	Plasma Astrophysics
Prof. Dr.	徐承建	Hannover Medical School / Centre for Individualised Infection Medicine (CiiM)	Clinical Bioinformatics
Frau Prof. Dr.	李扬	Hannover Medical School / Centre for Individualised Infection Medicine (CiiM)	Computational biology for individualized medicine
Prof. Dr.	文东升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Thermodynamics
Frau Prof. Dr.	史珊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Hamburg	Integrated Metallic Nanomaterial Systems

## 2022年年会“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论坛



出席2022年学学年会的会议和会员和嘉宾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病毒学研究所前合影

在经历了两年的网上年会后，2022年的德国华人教授学会年会终于在7月23号和24号在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的病毒学研究所现场举行。22名会员和6名应邀嘉宾及两名媒体记者现场出席了会议。另外，还有三名会员和一名应邀嘉宾通过在线形式出席了会议。

会议于7月23号下午两点开幕。德国华人教授学会主席明斯特大学蒋晓毅教授和会议组织人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学研究所陆蒙吉教授首先热烈欢迎大家的到来。随后，作为“东道主”的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主管国际交流副校Karen Shire教授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院长Jan Bauer教授做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特使教育参赞黄伟博士也做了简短的在线发言。

这次年会以“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为主题，组织了两场精彩的报告会和论坛讨论。

慕尼黑工业大学的孟立秋教授在活动上半场主持对“在德国建立中国能力”这一主题的论坛。首先，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从事中国政治和社会研究的海贝勒(Thomas Heberer)教授在他的报告中详细解读了何谓“中国能力”。研究中国已经50多年的海贝勒引述了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名言：试图在不了解中国历史的情况下了解当代中国，就像在山中盲目飞行。他复强调：“如果你想传达关于中国的知识，你需要第一手数据。良好的中文能力，与中国各界保持联系，并且经常到中国不同的地区去深入研究，是培养‘中国能力’的必要条件。随后，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能



源系侯正猛教授介绍了克大“中国周”活动的情况，德国应用管理大学创造与创新研究院院长唐敏教授介绍了她们的中德创造力互动项目。无论是“中国周”活动中邀请重要人物参与，还是互动项目中赴中国的实地考察，教授们从实践中探索出许多加强“中国能力”的宝贵经验，包括增加相关活动的参与感，鼓励感兴趣的朋友去中国亲自感受，对等交流的重要性等等。在接下来由孟立秋教授主持的嘉宾讨论内容涵盖孔子学院的活动，舆论和政治压力对中德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中德合作中有待改进的方面。如何解决这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孟立秋认为，一是对等交流，倾听对方和理解彼此尤为重要。二是并肩前进，中德合作是一种携手并肩的关系。三是正视现实，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四是综合两种文化思考问题，关注和加强文化之间的共性。

在论坛的第二部分由纽伦堡工业大学的韦乃铭教授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德国经济对中国依赖度的一些基本数据，分析了2016年中国美的集团收购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德国联邦政府开始强调技术主权的过程。在嘉宾讨论中，前赢创工业公司董事俞大海博士认为，中国和欧盟在某种方式上减少双方依赖性是正常的现象。中国正在大力开发自主的技术，对欧美的技术依赖性在降低。另一方面，中国在积极发展东南亚、非洲和南美市场。欧盟企业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找到新的与中国共同合作的领域。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副校长丁永健教授表示，首先要看到中国企业收购库卡给德国社会带

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其次，分析中德之间所谓的2%的依赖程度，如果看几个具体的领域，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例如汽车领域德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可能就高达40%，化工领域更是离不开中国。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汉堡大学张建伟教授表示，最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科技飞速发展，很多科技攻关项目陆续取得良好效果。中国的产业链完备，许多商用产品开发速度领先于欧美，例如人工智能、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要说到中国优势的特点，其中就包括庞大的工程技术人才。因此，如果说欧洲或德国对中国有依赖的话，应该主要是依赖中国丰富的人才。

尽管听众还期待更多的交流，但是由于时间限制，现场的交流只能先告一段落，在夕阳的余晖下，本次“德国的中国能力建设”论坛活动圆满结束。

## 我的汉学生涯

### 三山掠影：反思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性”和华语文学研究

杨治宜

杨治宜，江西宜春人，1998年入北大中文系（文史哲实验班）学习，保送北大比较所硕士，2006年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深造，2012年博士毕业，来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任教，三年后获得终身讲席。

#### 导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子瞻先生是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也是我人生的精神导师。说来可笑，记得大约是二零一五年，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英文专著 *Dialectics of Spontaneity* 在博睿（Brill）出版之前，我梦见了苏轼：一座云雾缭绕的高山上，我走进一所古色古香的书院，弟子乌坐如云，诵音清圆，而讲坛高踞的，正是苏子瞻。课后我与子瞻散步，在山顶悬崖上的清风里，跳了一支阿根廷探戈。

我的梦中，时与古人神游，但都不如此梦美妙而深刻。我想，这也是人文研究最有别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处。孟子曰，知人论世。虽然我在理论上始终持诗无达诂、诗人与作品关系无法确定的观点，但浸润古人文字，难免对其人之“真实”产生自我臆断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也许正是让我们有更深广的生存视野、养成我们对“他人”之同情的必要途径。人文学科的无用之用，恰在于此。苏子瞻在感慨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的困顿时，定然不曾想到千年之后，有无数读者在面对艰难苦恨时会从他的诗歌和态度中汲取力量。语言虽无形，归根结底是如猿鸣鹤唳一样随风飘散的声音、以及代表了这些声音的图像，却通过想象力的传承，联结了人类经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虽然我此生不能成为苏子瞻那样的作者，但有幸与诗人们青春作伴，这只无知无畏的飞鸿，遂不知不觉掠过了三大洲，在异国的雪泥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爪印。以下是我的一些粗浅的个人感想。

## 汉学、国学、中国学还是华语语系研究

理工科的朋友经常问我研究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貌似容易，但是其实最不容易说清楚。简单说是中国文学（主要是古典诗学）及其相关的美学、哲学、社会和政治问题。然而“中国”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当代的政治主权国家，进而和概括某人种或者文化的现代词汇“中华民族”及“汉民族”都有错综的关系，“中文”口语就严格的语言学界定而言更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多种俗语（vernacular）的总称，但“书面中文”则有纵贯历史的超强稳定性。所以“中国文学”研究到底属于汉学（Sinology）、国学（National Learning）、中国学（China Studies）还是华语语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这和“中国”概念之参照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息息相关。

四个概念里，最古老的是“汉学”，最早的词源是中国历史上的“汉宋之争”：汉学注重训诂注疏，宋学注重发明义理。今天的“汉学”主要指海外对中国学问的研究，然而“汉学”的中文词源和今日的意涵也并非全无渊源，其连接点就是日本历史上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日本也好、最早通过传教士接触中国文化的欧洲也罢，我们不妨说，“汉学”主要是指对中国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的理解、研究和介绍，其目的在于“了解中国”，也正因为此，今天在很多学者眼里它都是一个“过时”的词汇。

“国学”这个现代汉语词汇同样来自

于日本，与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朱子学”和研究西方学问的“兰学”（兰指荷兰，代指西方）相对。此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或曰国族主义）背景，即起源于欧洲17世纪、兴盛于19世纪的一种理念，认为主权国家应当与民族（nation）等界，至于民族如何定义，迄今为止纷争不休，堪称世界政治史上最强大也最模糊的概念。不论如何，共同语言（俗语）和文化经常被视为民族的基本特征。所以要成为独立民族国家者，首先要有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化，以“民族”建设为目的对本“民族”文化的研究即“国学”研究——这个陈述句隐含的循环逻辑也意味着研究民族文化的过程即建构民族文化的过程。日本“国学”一词在晚清通过留日潮传到中国，便兴起了欲与“西学”抗衡的国学派。但如Joseph R. Levenson等学者指出的，在国学派看来，诸如民主、自由、科学等价值，都是中国“自古有之”的优良传统，但其实这样对古代传统的重新发明完全是以西方思想为参照系的，最多是为“现代性”寻找一个中国（最好是先秦）的出生证罢了。因为对马列主义普世真理的追求，大陆49年以来是长期不用此词的，但近三十年来也重新复兴了，在不少情况下，其隐含的政治目的都不妨说是在于为现行制度重新寻找传统思想资源的“出生证”。

“中国学”兴盛于二战后的美国，与冷战的大环境息息相关，也常常被视为

侧重社会科学的“地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分支。显然，“汉学”这样起源于训诂考证的学问，已经不能回答“我们为什么丢失了中国”这样的问题了。今天美国大学里，中国研究一般置于东亚研究之下。“东亚系”主要侧重文史哲、文化研究，而“东亚中心”则一般提供跨越人文社科的研究平台。

“华语语系研究”是一个诞生于21世纪初的新词。Sinophone是借鉴Anglophone, Germanophone, Francophone等词所造，指包括但不限于“现代标准普通话”（“国语”）在内的所有华语语系语言。最早提出此词的史书美教授其实意图把它作为“离散”

（diaspora）的替代词，反抗“离散”一词中天然蕴含的“中心”（中国大陆）和“边缘”的等级关系。她定义的华语语系研究范畴不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后来修正为不包括大陆汉族）。但这一排斥性的定

义事实上恰恰重新强化了隐含的中心—边缘对立。正因为此，目前绝大多数研究者已经把中国大陆的文学文化包括在了“华语语系研究”在内。在我看来，这一概念的优势在于更加符合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生产现状。譬如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严歌苓、杨炼等作者事实上是长年居住海外的），很难用“中国文学”一词概而括之，恰是因为“中国”今天常常被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实体及其主权统摄下的人群和地理范畴之故。“华语文学”概念为这些多元、多样的作者们提供了一个中立的描述词汇和研究平台。

而这些对“中国性”（Chineseness）的反思，是居住在大陆疆界内的学人很少感同身受的，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无独有偶，也是苏轼的诗句）。所以离开中国这座大山，虽然有无缘深入其幽谷奇穴的遗憾，但多了一重远观的视野。

## 中-美-德教育之浅见

理工科朋友另外一个经常问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北大去美国学习中国文学。怎么说呢，前几天看到纽约城市芭蕾舞团有史以来第一位亚裔首席舞者陈镇威的访谈，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自己的成功是中国式严格训练加美国式自由表达的结果，也就是体系与个性的结合。我想，正如中美训练体系各有所长一样，不同文化的教育体系也是各有所长，体验不同的教育体制本身就对学人有

启发意义。

我是中国层层选拔的优选制度的幸存者。从小学到中学，一路重点学校重点班，这种尖上拔尖的机制，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结果，中小城市的稀缺师资遂向少数学生倾斜，以保障顶尖学生高考成绩的美丽。无穷的选拔，让我对考试充满了厌倦感。燕园四年，我基本上是在图书馆和未名湖畔消磨的，立誓不为考试学习。未

曾料及的是，我饥不择食的知识兴趣，恰让我符合了另一种标准：人文学术的标准。靠着大学三四年级选修课写的论文，我顺利保研。是的：写论文让我感到无穷的乐趣。一头钻到某个古怪的题目里，驻扎到图书馆的各个开架区，心理学、人类学、西方哲学、艺术史、古典文学，一本本抽下书架上所有标题吸引我的书来看，寻找知识与知识联结的边界。与人的恋爱是苦恼的，与书的恋爱是永远有回馈的。但我读书生涯的不苦恼，完全是偶然。中国又有多少“小镇做题家”牺牲在大学、研究院乃至人生的环节呢？

普林斯顿的校园文化和北大最相像的地方，是学生的优越感和竞争心。不同之处是北大更多文人气，而普大更加贵族化。它没有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这些热门应用学科。本科生实行博雅教育，第一大专业是历史；外语选修课里，十多年前中文的热门程度就已经超过了法语，仅排在西班牙语之后。录取名义上是无视家庭条件的，择优录取，按需分配——但事实上，学生的家庭状况体现在申请条件的方方面面，包括是否世代校友、课外成就、志愿活动等项目，大富之家的学生比例是极高的，由此形成全球富豪阶层的“内循环”。因为本科毕业生们基本都去了华尔街，博士阶级就比较贫寒了，但拜全额奖学金所赐，得以专心学术。那是一个“钱”的概念仿佛不存在的象牙塔，而象牙塔外，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美国。记得第一次去纽约，首先是为曼哈顿地铁的肮脏和遍地的流浪汉所震惊。我乘地铁去哥伦比亚大学，混淆了东西，误入哈莱姆区，街上问哥伦

比亚大学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而他们说的西班牙语和口音浓重的英语我也听不懂，最后只能拿着地图找路。但其实，经过一个小花园，哥伦比亚大学就到了。同一条街道两端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邮编意味着富有、教养和品位，毗邻的邮编则意味着贫穷、犯罪和绝望，代代相传。这种财富、知识、视野和前景的两极分化，也是今日美国民主陷入僵局的根源。

德国的社会及教育体制，在我看来是精英民主和社会民主制度之间的健康平衡，也是困难的平衡。其长久的成功与否当然尚不可知。我刚到德国来的文化冲击，是觉得本科生都不求上进，哪怕有比较优秀的学生，也在尽量掩盖自己的野心，力求泯然众人（这与德国媒体哀鸣学生太注重 *Leistung* 的观感截然相反，可能是参照系不同所至吧）。后来渐渐觉得，尤其和大陆学生相比，德国大学生不论学业如何，都是成熟的个人，能够且应当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乃至错误和弱点负责。大学教育不是和人生隔绝的阶段，而是从家庭庇护走向独立社会人格的重要“实习”环节。想通了这点，我对学生的态度也改变了，把重点从传授知识渐渐转为引导和陪伴。这几年，有几位蹉跎多年、无法完成学业的学生，在我的帮助下成功拿到了本科学位，而且还写出了颇为优秀的论文，这让我感到了做教师的成功与责任。

中国学者的通病，是论述西方制度时仅仅以美国为参照系，似乎美国经验足以囊括西方的利弊。我自己来德国之前，对欧洲的教育和社会制度也没有真正的体验。

我想，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及语言能力，是我们这个时代依然亟需的。中德文化的互补性很强，中国如果进入后疫情时代，

德国华人教授协会应该在中德交流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仅加强德国的“中国能力”，也需要加强中国的“德国能力”。

## 从宋代到数码时代

最后回到我研究什么问题上来。我选择的博士研究是通过苏轼诗文，探讨“自然”（spontaneity）作为美学和伦理理念的辩证与反讽。英文专著顺利出版，中文版（《“自然”之辩》[三联2018]）且有幸入选三联学术精品，与众多国内读者见面。

但我却放弃了这条“内外开花”的古典诗歌研究之路。来到德国之后，我的研究中心从宋代文学慢慢转向了近代乃至现当代、数码时代的古典诗词。这是因为浸淫北宋诗学多年后，我对北宋士人产生了无比的亲切感。欧王苏黄、乃至米芾李清照，在我看来都是具有高度现代性的人格主体。北宋的文化和政治的风雅和清平，也是令人神往遐想的。那么这么一个高度繁荣的中古文化，为什么没有沿着“进步”的内在理路开出真正的现代性？传统文化何以成为与“现代”格格不入的东西？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从民国诗学和史学开始整理，因此发现，传统诗歌、美学乃至士人的人格理想，其实在现代中国始终没有消亡，但是被革命的、进步的、科学的叙事方式排斥出主流，因此不曾纳入正统的学术视野。以古典诗词为例，其实创作者连绵不绝，但除了毛泽东诗词的特例之外，都不曾进入“现代文学史”。我们的所谓“现代文学”是为五四新文学观主导

的。古典诗词写得好，叫做“爱好”，既不能入史，也不能得到文学奖，或者为研究者、翻译者注意，参与到“世界文学”（英语及英语翻译文学）的主流中来。对现当代诗词的关注，意味着对“文学史”和“文学机制”的解构，也意味着对一切正统意识形态的反思。

出于对国民革命时期的第一大诗词团体南社的兴趣，我渐渐注意到南社成员汪兆铭（精卫）的文学观。他所主张的新诗与旧诗应当并存、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的观点，事实上是具有相当客观性的。而他的这种文学折中论，似乎与汪氏在国民革命时期调和国民党左右两派、中日战争时期通过调和中日和平止战的立场也不无类比之处。汪氏诗词，辞句幽婉深壮，情意动人，负誉一时，而其“附逆”期间的作品，也无处不透露出内心的沉痛与爱国的情怀，以至于2012年香港重版的《双照楼诗词稿》获得余英时、叶嘉莹作序，一致从“诗言志”的立场，认为汪氏投敌有巨大苦衷、甚至是千古“冤禽”。但是历史作者和“诗歌人格”之间真的能画等号吗？诗与史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汪氏在“新文学”时代以诗词、文章、道德建构起来的传统士大夫形象，又对他的政治生涯有怎

样的影响呢？诗歌又怎样形塑未来对作者的历史记忆？从这些问题出发，结合我本人文学、史学与哲学的背景，我完成了《诗歌·历史·记忆：汪精卫与战乱中国》（Poetry, History, Memory: Wang Jingwei and China's Wartime Collaboration）一书，英文版将在明年将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付梓。由于大陆迄今为止对“通敌”研究的禁忌，我希望在台湾出版中文版。华语世界的多元性，是其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保障。

汪精卫一书初稿完成时，恰是2020年春季。我当时在另一座学术象牙塔——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眼睁睁看着集体学术生活分崩离析，走向线上。这之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局，让我对数码技术如何重塑“中国身份”乃至我们对中国古典传统的想象产生兴趣。我这两年的研究，亮点是提出了“华语古典主义”（Sinophone classicism）的研究范式。如果说所谓“中国传统”常常服务于具有中国中心主义、传统本质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宣传，那么“华语古典主义”一词则反之。如前所述，“华语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和所有以某种华语语系语言为交流及文化创作媒介的空间，这是一个平等的、多元的、去中心化的空间，在今天经常由数码技术相联。“古典主义”指对中国古典传统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召唤（evocation）、转化和重建，其目的多样，可能是权威主义、民族主义的，也可能是反西方中心主义、去殖民化的，甚至可能是前卫的、反抗权威的。在我们当代的语境下，“华语古典主义”始终是面对“西方现代性”的镜像参照系而衍生建构的，

其美学和内涵（譬如“中国风”、“汉服”、“古典舞”、网络先锋诗词）也必然是杂糅的。这一范式自我去年提出以来，已经获得多位学者响应，包括王德威、田晓菲、奚密等前辈学者都正在参与我倡导主持的相关讲座及特刊。然而归根结底，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性，也在于我对自身身份和生存处境的反思。

我个人正在写作的第三本专著，暂题为《律魔：革命中国的古典抒情》（The Haunted Prosody: Lyric Classicisms in Revolutionary China）。这本书将考察国民革命、文学革命、共产革命、文化革命乃至数码革命时期，“革命”概念与古典诗词形式之间的张力，诗词在美学及功能上的演化，它与“新诗”的关系，及其社会学样态。

回首我短短的学术生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术自由对学者的重要。我的中国研究没有话题的禁区，没有分期断代的限制，也没有研究方法的畛域。说起来，苏轼成为苏轼，也恰是流放岭海、离开权力中心、在困顿之中通过精神的自我放逐而重新获得内心自由的结果。追随子瞻，在大海的彼岸回首故国，我听见时间的波澜。

## 结语：面对未来的为己之学

---

不论怎样的文字，是创造性还是学术性，都是必须面对未来的。囚禁在肉身中的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必然基于此刻的存在和过去的记忆。子曰，古之学者为己。我们将以怎样的文字，面对未来的自己，而依然无愧无悔呢？我想，这是每一位学者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容我这里引一段自己在一篇写周作人的中文文章（〈沦陷的日常〉，载《中国现代文学》2020年第38期）结尾的话，作为这篇小文的结语：

历史不是高速公路，而是布满无数人深深浅浅脚印的荒莱。如果说在治平之世还有大一统的国家以其权威命令指引方向，而民众只有依之违之两种选项的话，那么乱世则连明朗的方向亦无之。许多历史学家的任务便是在这些凌乱脚印中辨出主流、旁流、支流和末流来。而文字学者的任务，则在于聆听那些倒在草莱间的白骨的细语。历史的胜利者们从来是不需要侧耳聆听的：他们住在十三陵、水晶棺里，他们的事功言语勒石立碑，有留声机广播，有历史课本灌输，早就不朽了。不过，对注定是要审判系狱、身败名裂、挫骨扬灰

的历史失败者而言，是否依然有权利利用有朽的文字、抒发一瞬间的私愤和不敬、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之外保留一点点个人的表达自由？读诗读史的诸君，又有几人能保证永远做历史的胜利者、或者只为城头变幻的胜利者们欢歌呢？

2022年11月于法兰克福天水碧斋



## 人生的意义在路上 Der Weg ist das Ziel — 采访刘晴教授

丁永健



汉堡大学企业管理系航运经济专业刘晴教授

“好的人生，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它是一个方向，而不是终点。”

— 卡尔·罗杰斯

**丁永健：**刘教授您好！学会期刊编委委托我采访一位80后会员。我们上次在杜塞尔多夫学会的2022年线下年会上相谈甚欢，就想到了您。冒昧打扰了。

**刘晴：**丁老师客气了。学会那么多优秀同仁，您偏偏想起了我这位不太出色的懒散分子？

**丁：**不太出色就这么年轻拿到了德国精英大学的（W1）教席？我在您这个年龄，还在核电站一线跌打爬滚呢！您是否从小就是一个学霸？能否给大家讲讲您的成长经历？

### “学渣”的求学道路

**刘：**不怕您见笑，我的自我认知，就是一个非常的“非典型反传统“学术圈“学

渣”。其实很好笑，我的前30年，完全可以用稀里糊涂和曲折不断来简单总结。我有很多教训和辛酸泪，倒是愿意简短分享一下，也许对一些和我一样走过弯路，甚至迷茫的朋友们，有一点鼓励作用。

简单地讲，我还算是从小不需要父母过问的那种天生好学的孩子，成绩一直很好，但也许高三时有点抑郁吧，高考就考得超级差，心灰意冷，就随便由父母做主给选了一个热门适合就业的专业。而我那时候大一进了学校，就萌发出毕业去美国的想法，也没想过做什么研究，很肤浅的想法就是想拿奖学金去美国读书顺便免费旅游。申请大学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到了美国没多久，又稀里糊涂闪婚，到了时候也顺从大环境生了宝宝，后来我又做

了单亲妈妈，独自带着孩子来到德国。当然这个过程可以是很多曲折的，一两句也说不完。我想以后如果我写回忆录，可以再仔细说说！

丁：我们先谈谈您的求学之路吧，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可以和学会的同仁们，包括一些关注我们的年轻学者们分享？

刘：我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不典型了。但是也还是可以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吧。

我一直认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当然我绝对不是鼓励大家都去多犯错误，多吃苦，但是我对待挫折的心态还算比较好，所以反而让挫折成了我的财富吧。在竞争激励的学术圈，有太多优秀聪明又勤奋拼搏的同僚，很多人压力非常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一直比较保持自己的节奏，不太会被外界影响。我想，这可能跟我的人生观有很大关系。

我一直比较看重内在的自我认同和人生的平衡。而且有了孩子之后我选择了亲历亲为，因为我觉得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需要父母特别是母亲的亲自陪伴。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孩子和家庭身上，就必须接受工作上的精力和时间减少，所以会一直面临压力，往往觉得对孩子对工作都没法百分百的尽力而感到困扰和内疚。所以也是真的有了孩子之后，我对职业女性的困境有了真正的体会，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也想和同样困境的朋友们分享。

但是回到我自己的反思，我觉得，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工作是因为我有兴趣，不是为了表面的成绩，所以即便面临很多的挑战和挫折，平衡和长远的眼光会让我更有韧性和大局观。我更能坦然接受事业

上的挫折，不局限于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也更不会轻易放弃努力。

举一个例子吧。大概28岁左右的时候，我博士未毕业，就被导师推荐去了一个大学研究所负责他们交通经济方面的小组。去了之后也发现当地非常保守和排外，莫名其妙得受排挤。运气又不好，一年后研究所突然丢了美国联邦的科研资助，没钱了。大家拼命找钱。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半年里在州里搞到两个半小项目，大概能有20万美元，也算是完成了最低指标。然后最终，研究所还是一步步减员，所以我也只好走人。而那两年里，我忙于做项目找项目还有研究所的人事政治，同时博士匆匆毕业，导致了在博士毕业后却还没有文章发表的尴尬局面。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一边重新找工作，一边独自重回科研发表的老路。也就是说，这两年在当时看来是一个错误，浪费了我本来应该专心科研，发文章，和找教职的最宝贵的时段。这两年里一边是充满敌意和看似无效的工作，一边是要博士答辩的紧张，家里还有2岁的孩子和马上崩离的婚姻，甚至还有家人的完全的不理解。那时候身体和精神上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我在两年里，被逼迫的迅速成长成熟。不仅仅是对人生的看法，对人事关系的看法，调节心态的能力，还有英语沟通甚至辩论和吵架的能力，都有了质的改变。在一帆风顺的状态，甚至温水煮青蛙的状态，都是得不到这些宝贵成长的。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一个座右铭都是尼采的那句名言，杀不死我的让我更强大。

## 科普一下航运经济专业

丁：完全理解。那么能否给我这位电气工程师科普一下航运经济专业的内涵和特点？

刘：航运经济属于交通经济的一个小分类。研究题目主要是国际物流（比如中美集装箱进口，中欧集装箱进口）优化问题，港口竞争，交通网络，还有航运市场的各种竞争合作问题和运价波动问题。我目前的主要研究兴趣是通过对交通网络的优化分析来比较宏观的分析政策影响。比如最近发表不久的一个研究是对整个欧洲内部集装箱港口网络和中欧网络的分析，我们注意到希腊的Piraeus港口的非比寻常的中心地位，这跟中国的投资显然有很大关系，也对汉堡港和中国航运企业的关系有一定反思意义。我接下来正在做的一个是对欧洲港口网络抗打击的弹性能力（resilience）分析，初步的结果也有一些很有意思和希望能对国家战略有一定参考意义。交通物流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也在近几年的宏观形式下越来越表现出它对一个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和同时的脆弱性，比如最近的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所以它跟国家政策密不可分。

丁：您的研究方向目前很热门啊！具体有哪些课题呢？和国内有哪些合作项目？

刘：目前正在作为联合负责人之一参与一个欧盟项目，自动船舶在欧洲内河航运的应用。所以将来相关的一个方向是内河航运和运输经济可持续性问题。我对这个题目感到很兴奋，也正在发掘更多拓展合作的可能，比如可持续性方面，life cycle研究，以及政策分析。

在和中国合作方面，虽然一带一路也是我持续关注和研究了几年的一个主要研究题目，我主要还是小规模“民间”的个体之间合作，没有大规模的校级合作。这也跟这三年的国际形势有关。曾经有过机会跟国内的某著名大学建立更正式的教学科研合作形式，因为德国这边的原因而无疾而终。

## 关于未来的人生规划

丁：是的，校际间合作没有热心的教授不行，但是系里和学校的支持也非常重要，有些事情也靠机遇。最后说说未来打算吧，不仅仅是工作，我作为50后一代，也对您们这些独生子女一代的未来人生规划感兴趣。

刘：好的，先说工作。助理教授在德国属于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职位，也面临很多挑战，困难和不确定。比如说吧，助理教授都是没有自己的秘书的，很多也都是没有博士生。然后日常工作中的很多行政任务和教学，都要自己亲自处理。其实很耽误时间和精力。相比之下，专心做科研的博士后就有优势了。或者就干脆W2以上的职位会配备秘书和学生。另外不少德国的W1职位都是没有tenure track的，而德国似乎还有严格规定，一个学者最多可以多少年的时间最终拿到终身教授。这个具体其实我目前还没有太多研究。总之吧，我看到很多年轻学者，博士生，博士后甚至和我一样的助理教授，他们的不安，担忧和焦虑。我因为经历过之前，非常理解。但这个事情说起来真的很复杂，特别是每个

人都有不同的情况，我们篇幅也有限，我尽量精简的说几句吧。众所周知，年轻学者在博士毕业之后普遍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能否拿到终身教职，因为一般的研究职位都是固定合同，所以总是随时面临经费不足或者要换工作甚至换地方的不稳定，这和要养家糊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产生直接的矛盾。这像是两个极端，而在中间的一个选择是去公司，行政岗位等等。但是那又意味着要放弃学术，而且甚至是放弃了自己多年的积累，要从头开始一个陌生的领域。另外还可以选择应用型技术型大学，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可以兼顾科研和应用，只不过听说教学任务比综合性大学会重一些。但是我对德国的各种体系也还在了解过程中，其实关于这方面，可能您是最有发言权的。其实我很想听一下您的分析和建议？

不过先总结一下我的意思就是，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面临众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对多数人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似乎哪条路都很难，都很难立刻有保障，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同龄人，在直接本科或者硕士毕业就开始进入企业，政府机构，甚至创业之后，现在多数职业已经步入正轨，甚至开始了中层领导职位。作为曾经非常优秀，又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学术精英们，感受到的自我怀疑和担忧是很普遍的。

对这个事情，我是这么想的。首先，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不对的。你/我们读到了博士，已经对你/我们的聪明才智有了最基本的证明，不要被一时的不顺和局部的限制迷惑了，以为自己不够强，不够努力，甚至认为自己前途迷茫。另外一个人可以

有多种选择可能，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特权！选择可以给人很多苦恼，但是它其实是我们需要感恩的一件事。选择权多是一件值得感恩和骄傲的事情，而不是自我怀疑和万般痛苦。另外，从积极的心态出发，很多做科研的朋友都是一路读书上来，其实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究竟想做什么，适合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们慎重思考来设置人生走向。

不瞒您说，我这几年又在积极的反思自己的人生。我其实真的很感恩过去的经历，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两件事。

第一，勇敢的做出困难的选择，带我走进全新的更丰满和美妙的世界。

第二，理解和顺从自己的内心，路会越走越顺，脚步越走越轻。人总是在成长变化的，所以人生目标和道路也没有理由必须一成不变。用我特别喜欢的心理学家Carl Roger的话说，就是“让经验成为我们人格构建的起点，而不是试图将我们的经验融入我们对自我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中”。

丁：学习了，您虽然比我年轻一大截，但是人生思考比我深入多了！说到应用型大学HAW作为一种不一样的学术道路，也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如果您下次向编辑部请缨采访我，可以深入探讨各种利弊。简单地说，如果从UNI的W1教职转换到HAW的W2，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毕竟W2通常也是终身公务员职位。当然这种转型也需要适应，毕竟HAW的特长不是在基础研究，而是偏向应用课题的研究，HAW教授们的教

人都有不同的情况，我们篇幅也有限，我尽量精简的说几句吧。众所周知，年轻学者在博士毕业之后普遍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能否拿到终身教职，因为一般的研究职位都是固定合同，所以总是随时面临经费不足或者要换工作甚至换地方的不稳定，这和要养家糊口的基本生活需求产生直接的矛盾。这像是两个极端，而在中间的一个选择是去公司，行政岗位等等。但是那又意味着要放弃学术，而且甚至是放弃了自己多年的积累，要从头开始一个陌生的领域。另外还可以选择应用型技术型大学，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可以兼顾科研和应用，只不过听说教学任务比综合性大学会重一些。但是我对德国的各种体系也还在了解过程中，其实关于这方面，可能您是最有发言权的。其实我很想听一下您的分析和建议？

不过先总结一下我的意思就是，站在人生的交叉路口，面临众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对多数人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似乎哪条路都很难，都很难立刻有保障，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同龄人，在直接本科或者硕士毕业就开始进入企业，政府机构，甚至创业之后，现在多数职业已经步入正轨，甚至开始了中层领导职位。作为曾经非常优秀，又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学术精英们，感受到的自我怀疑和担忧是很普遍的。

对这个事情，我是这么想的。首先，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不对的。你/我们读到了博士，已经对你/我们的聪明才智有了最基本的证明，不要被一时的不顺和局部的限制迷惑了，以为自己不够强，不够努力，甚至认为自己前途迷茫。另外一个人可以

有多种选择可能，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特权！选择可以给人很多苦恼，但是它其实是我们需要感恩的一件事。选择权多是一件值得感恩和骄傲的事情，而不是自我怀疑和万般痛苦。另外，从积极的心态出发，很多做科研的朋友都是一路读书上来，其实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究竟想做什么，适合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们慎重思考来设置人生走向。

不瞒您说，我这几年又在积极的反思自己的人生。我其实真的很感恩过去的经历，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两件事。

第一，勇敢的做出困难的选择，带我走进全新的更丰满和美妙的世界。

第二，理解和顺从自己的内心，路会越走越顺，脚步越走越轻。人总是在成长变化的，所以人生目标和道路也没有理由必须一成不变。用我特别喜欢的心理学家Carl Roger的话说，就是“让经验成为我们人格构建的起点，而不是试图将我们的经验融入我们对自我的先入为主的概念中”。

丁：学习了，您虽然比我年轻一大截，但是人生思考比我深入多了！说到应用型大学HAW作为一种不一样的学术道路，也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如果您下次向编辑部请缨采访我，可以深入探讨各种利弊。简单地说，如果从UNI的W1教职转换到HAW的W2，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毕竟W2通常也是终身公务员职位。当然这种转型也需要适应，毕竟HAW的特长不是在基础研究，而是偏向应用课题的研究，HAW教授们的教

学任务也重一些，相应的科研时间也会少一点。但是这些困难对一个热心于科研的人，也是可以克服的。

不好意思，说到HAW我就忍不住有点扯远了。我们回到家庭和孩子的话题。德国的单亲母亲其实很多的，华人教授里面也许不多。不过您这么年轻，各方面条件很好啊，要改变应该不困难吧？

**刘：**您取笑我了哈！人生当然不能只是工作和孩子，友谊和爱情是非常美好的一部分，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聊！不过我觉得您关于采访的建议非常好，我相信很多人对不同的人生规划都很有兴趣，特别是您说的HAW的方向。不过我觉得更好的是让80一代们集体采访你们，我相信每一个前辈身上都有无数宝藏可以挖掘！我们人胆子能大点哈哈！

我最后再说说长远人生规划吧。作为中国80后出生的一代特殊的独生子女群体，我们对未来的打算是有很多限制的。我很幸运，父母相对年轻身体也很好。我的大概计划是10年后孩子上大学独立了，我可以回国兼职或者两边跑。不仅仅是为了照料一下父母，也是另一种职业可能。我对未来充满好奇和乐观，人生有众多可能，定义成功和幸福的方式有很多，最可怕的事情是“自我设限”，是我们被他人告知并且相信，怎样活着才是对的，才是成功和幸福的。学术是一件我们因为享受才进入的局，不忘初心，才能永葆动力。哪怕不做学术，也可以换一个领域从头再来，没有什么路是白走的，之前的经验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准备，因为适合的才是对的。

未来不是充满未知和迷茫，而是拥有无限可能。

**丁：**您的最后几句我特别赞同，共勉！谢谢刘老师花时间接受采访！

**刘：**谢谢您的宝贵时间，欢迎大家指正。

## 读书笔记 — 《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外交政策》

孟立秋

Joseph S. Nye, Jr., 以下简称奈, 对于道德在1945年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于2020年出版了《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外交政策》一书

(*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外交政策的道德成份和国家利益成份

伦理和道德在本书中为同义词, 指的是对与错的判断。伦理是相对抽象的正确行为原则, 而道德通常指个人的良心。

在书中奈将美国1945年后执政的14任总统分为6个阶段:

- 新时代创始者 - 罗斯福, 杜鲁门, 艾森豪威尔
- 越战时期 - 肯尼迪, 约翰逊, 尼克松
- 越战后缩编时期 - 福特, 卡特
- 冷战后 - 里根, 老布什
- 单极时代 - 克林顿, 小布什
- 21世纪权力转移时代 - 奥巴马, 特朗普

奈对比了这14任总统执政期间的外交政策。他认为, 总统们的决策并不完全受制于制度结构, 而是有选择余地的。大凡有选择, 就存在一个相对道德的选择。

特朗普在2017年的就职演说中宣称“从今天起, 将是美国优先...。要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榜样, 而不是强加给

任何人...””。这番话使特朗普又得到了不少支持者。这些支持者认为, 公投选出的国家元首理应代表国民, 捍卫国家利益。然而, 美国优先在当时的国际环境里是唯一正确的决策吗? 公民们是否也希望总统在外交政策中彰显道德高度, 担负起超越国界, 使整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责任呢? 2018年沙特异见记者卡舒吉 (Jamal Khashoggi) 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遇害后, 有人认为特朗普对此无动于衷是必要的, 因为与沙特王储保持良好关系, 获取石油、销售军事装备和确保地区稳定是国家利益。也有人批评特朗普作为总统无视这一践踏人权的罪行是不道德的。

这些争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 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和原则就一定符合国家利益吗?

从修昔底德 Thucydides (公元前约460 - 约400)、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 和马基亚维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等经典思想家那里我们可以瞥见一些现实主义思想的雏形: 这些思想家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

里，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道德的。强者做他们想做的事，而弱者则必须承受的。与此相反，秉承启蒙哲学家康德传统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基本价值观普遍适用于所有情况，包括外交政策。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又都过于简单地认为外交政策中的道德选择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今日社会上存在一种公知，认为外交和打仗是一个道理，讲究兵不厌诈，伦理是不起作用的，或顶多就像在蛋糕上涂的一层糖衣，而真正构成“蛋糕”的是国家利益以及治国经验。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制定秩序，各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防御系统。尤其是国难当头时，任何捍卫国家的求生手段都是合理和道德的。按照这种逻辑，评判一位总统的外交政策对不对，大家认为这取决于这个政策对总统代表的国家是否有效，而不是道德

不道德。

这种公知乍听有一定的道理，但它用过度简化的方式回避了伦理难题。没有世界政府并不意味着没有世界秩序。一些外交政策与国家的生存有关，但大多数外交政策并不涉及国家的生存。自二战以来，美国卷入了几场战争，但没有一场是美国的生存所必需。关于人权、气候变化或互联网自由的外交政策也不涉及武力战争。

事实上，大多数外交政策涉及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权衡，而不是僵硬的国家利益。对于国家元首来说，伦理价值观是“蛋糕”的关键佐料，而不是糖衣。奈从分析中得出结论，道德决策应该兼顾意图、手段和后果这三个维度。而手段既包括“有为”，也包括“无为”，因为选择行动和不行动，往往会造成不同的道德后果。

## 美国的例外主义及历史根源

1945年以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这个时期也被称为美国和平或自由国际秩序的时代。今日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很例外，很卓越。这种民族自豪感部分是基于共同的公民理想和国际主义合作的爱国主义，部分是沙文主义的骄傲和道德优越感。2009年，奥巴马曾经温和地说：“我相信美国的例外主义，就像我怀疑英国人相信英国的例外主义，希腊人相信希腊的例外主义一样”。政治科学家Stanley

Hoffmann曾指出，每个有归属感的公民都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尤其强烈。相比之下，法国在历史上一直受到欧洲权力平衡的限制，强大的左邻右舍使法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里同时充满忧患意识。而美国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却使美国人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来展示民族自豪感和推广他们的政治价值观。



纵观历史，美国的例外主义有三个根源：

### （1）开国元勋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

开国元勋们早早地为美国播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重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相信这种权利是普遍的。虽然他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实施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尴尬，比如，把奴隶制的不平等写进了起初的宪法。美国内战后一个多世纪的1965年，国会才通过了《投票权法案》，取缔了南方许多州的歧视性投票做法。

### （2）宗教根源

早期离开欧洲来到美国拓荒的清教徒，内心希望以更纯净的方式敬拜上帝。和以往的讨伐式的远征不同，清教徒们遵循“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理念，克勤克俭地要把新世界的人改造成为上帝的新选

民。

### （3）美国的疆域和地理位置

美国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并与较弱的邻国接壤，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19世纪初，美国还相对弱小，有必要采取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专注于向西扩张，对其小邻国实行帝国主义，对欧洲列强则采取谨慎的现实主义政策，避免卷入欧洲的权力冲突。这个政策也是今人所说的门罗主义。门罗（James Monroe 1758-1831）任总统期间（1817-1825）主张将美洲大陆从欧洲的权力平衡体系中分离出来，提出了“美国人的美国”的口号，制定了欧美两个政治领域的存在。可以说，门罗的学说决定性地塑造了泛美主义。这个学说后来被扩大到包括禁止将殖民地属地转让给其他国家。

## 威尔逊外交政策的道德光芒

一个国家的可选项随着实力的提高而增加。到20世纪初，美国在确立了在美洲的实力地位后才开始从全球的角度思考问题。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17年出现的威尔逊自由主义，即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任总统期间（1913-1921）提出的外交政策。威尔逊打破传统，派遣200万美国人到欧洲参战并改变了战争态势。当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全球力量平衡至关重要。威尔逊认为欧洲在传统上为了大国的利益而瓜分弱国的权力平衡，比如18世纪俄罗斯、

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波兰，是不道德的。因此，他强调美国在一战中的使命不是物质上的扩张，而是带领所有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国际社会。

1919年7月，刚从巴黎回到美国的威尔逊向美国参议院递交了那个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条约》。该条约是在1919年春天的巴黎和会上由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四国共同起草，英国、法国、意大利已经在这个条约上签字，现在只差美国。威尔逊希望参议院能迅速批准这个条约。但当时刚恢复为议院多数派的共和

党人对此充满敌意。威尔逊自己则因为刚经过一场小中风，影响了他的雄辩。共和党人担心美国作为国际联盟的成员之一无法体现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不同意批准该条约。随后威尔逊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使他再无回天之力。美国参议院最终拒绝签字。

今人开始明白威尔逊在领导起草这个条约中做出了他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贡献，他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超越政治和经济的考虑，是世界的永久和平。他为美国提出了关注世界和平的义务和愿景。威尔逊作为四国联盟的缔造者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当时的道德观比欧洲领导人更有远见，后者只关注领土收益。只可惜美国的孤立主义浇灭了威尔逊主义的理想。尽管如此，威尔逊作为一个思想领袖，深刻影响了罗斯福和杜鲁门在二战之后推行的美国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连极端现实主义的尼克松也深受威尔逊的影响，在白宫悬挂威尔逊的照片。

一战后，由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主张的《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并没有以新的角色引领世界和平运动，相反，在政治上走向了比以前更强烈的孤立主义。在保护主义笼罩下的美国，于1930年出台了最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将美国对数百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创纪录的水平。这个不顾消费者和出口商利益的闭关政策，导致美国进口急速下降，其他国家通过增加美国商品的关税进行报复，造成美国出口萎缩，继而连锁反应式地引发了世界范

围的贸易崩溃和经济大萧条。当时蔓延欧洲大陆的经济大萧条多少也助长了种族灭绝行动，为二战的爆发起了催化剂作用。

*\*威尔逊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但在那个时代还尚未实践普遍的人权。作为南方人，他赞同种族偏见以及他那个时代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沙文主义。他执政时期的美国容忍了奴隶制和种族隔离。而且他毫不犹豫地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进行干预，认为那样做是为了纠正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不良治理。*

## 二战后的新时代及美国在国际秩序中主导地位的起伏

残酷的现实使罗斯福认识到美国置身事外的孤立主义的后果，二战期间重启了美国的参与过程，并由杜鲁门继续推行，1945年创建了联合国，随后还促成了永久的联盟和持续的海外驻军。1947年面临和苏联的冷战，英国却无力支持希腊和土耳其时，美国取而代之。1948年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重建大量投资，1949年创建了北约，1950年代朝鲜战争中领导联合国联军在南朝鲜和支援北朝鲜的苏联和中国对峙。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的越南战争中，美国支援的南越与苏联和中国支援的北越较量。亚洲这两场大规模战争以共产主义的胜利告终。而且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家门口，唇亡齿寒的道理人人都懂，“美帝国主义”这个说法在中国家喻户晓。1960年，艾森豪威尔与日本签署了一项新条约，明确了美国对日本的防卫义务，防的是苏联，那时的中国太弱，无力构成威胁，而且因为阶级斗争造成了更多内耗，和蓬勃发展的美国在科技和经济方面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

当反差达到极值的时候，似乎冥冥之中就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来干预。1980年代中国幡然醒悟到发展是硬道理，急起直追

的同时，美国在两伊战争问题上却出现了比越南战争更激烈的辩论和党派分歧。世人也觉得美国的外交风格越来越霸道。美国一些鹰派人物甚至狂妄地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使用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来实现崇高的目标。

总体上，二战以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占了主导地位。随着苏联解体和东西德的统一，冷战结束了。西方自由民主在意识形态上胜过了共产主义阵营。令美国意想不到的，中国没有跟着苏联一起瓦解，而是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的新路，并拥有了越来越强的独立外交能力。与此同时，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多管闲事的名声开始产生负面的后果。美国不得不反思充当世界警察值得吗？出现伊斯兰国那样的不良后果算不算自取其辱呢？

在2016年的选举中，特朗普认为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让其他国家的人民受益而对美国不利。他紧紧抓住这点，将白人对少数族裔日益增长的能见度和影响力的怨恨与外交政策联系起来，并在美国成功制造了新一轮的保护主义乃至民粹主义。

## 国家元首的道德外交案例

我们很难选举一位十全十美的和平主义者，即无论如何都不愿派兵征战的总统。现实生活中，总统往往需要放下个人不愿杀戮的意志，遵从所谓的正义战争理论。

这个理论是罗马君主奥古斯丁(Augustine)在公元四世纪时提出的。当时，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秩序渐乱。奥古斯丁发现如果好人不保护自己，坏人就会占

就会占上风。如果所有的信众都固守《圣经》中不得杀人的戒律，他们就会被淘汰，世界就会被坏人主宰。于是奥古斯丁制定了战争理论，在一个局限的范围内允许违反不得杀人的戒律。现代军事法典规定，如果有人向你开枪，你可以还击，但对方放下武器并举起双手，你判明对方不是诈降时就不能再向对方开枪。

道理容易懂，但人类有时会遇到更加艰难的生存抉择。对于一些生死攸关的国际事务和不确定因素，并没有更高的跨国政府和可操作的法律，国家首脑不得在“道德困境”下做出选择。哲学家称这种道德困境为“脏手”问题，即如果你必须在损害其他人的前提下才能保护你受托保护的人，你就无法不脏手。

我们再来看看1945年以来美国14位总统的外交决策中的正反案例。

### 案例一 杜鲁门和美国投下的和没有投下的原子弹

农家之子杜鲁门从未上过大学，但他是个有分寸讲原则的人。当他被问及是否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时候，他并没有犹豫就批准了，这个残酷的决定使他饱受质疑。殊不知，1945年还有第三颗准备投掷的核弹，但被杜鲁门否决了。他认为广岛长崎这两颗核弹是为了尽早结束二战，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尽管死于核弹的平民百姓是杜鲁门不愿看到的。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杜鲁门觉得投第三颗核弹只能造成不必要的杀戮，这说明他有底线。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50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美军已经难以取胜时，

美国五星上将的麦肯阿瑟将军建议杜鲁门在中国的土地上投掷25到40颗原子弹，这样美国就一定会赢得朝鲜战争，杜鲁门本人也就能轻松获得1952年的总统连任。然而，杜鲁门果断拒绝了这个看上去对美国和他本人都有利的建议，因为他的道德底线是不想杀害无辜的妇女儿童。这个决策从表面上看上去不去挽救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败局，而他本人也没能再次获得总统连任。但真正的结果是避免了中国的无数生灵涂炭。

### 案例二 肯尼迪和约翰逊和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作为例子反映出了肯尼迪和约翰逊不同的决策原则。两人的动机都是要避免北越的共产主义蔓延。肯尼迪任总统时（1961-1963），呼吁美国人不仅要问他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什么，还要问他们能为世界做什么。因此，向越南派兵作战反映了他的价值观。但肯尼迪明确定义了一个底线，派兵数量不超过16000名，并且称他们为美国军事顾问。肯尼迪被暗杀后，他的继任者约翰逊却把派兵人数增加到65000名，导致58000名将士阵亡。曾经为这两位总统当顾问的McGeorge Bundy后来被问及如果肯尼迪不被暗杀，会如何决策。Bundy说，根据他对肯尼迪的了解，肯尼迪会在连任之后找个理由从越南撤军。和约翰逊情绪冲动的特点不同，肯尼迪在公众心目中是个明智者。而约翰逊则希望在公众心目中留下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印象，他来自德克萨斯，那里的民众推崇男子气概。他明知道越战的结果很糟糕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负隅顽抗，因为他不愿意被世人看成一个失败者。这种个人情绪扭曲

了他的动机，最终使越战成为一场灾难。

### 案例三 小布什和伊拉克战争

2001年出现9/11恐怖主义事件时，刚当选总统不久的小布什焦虑心情可想而知。他非常担心萨达姆·侯赛因正在研制核武器或者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当时各国的情报机构基本都有这个判断。因此，他作出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以为通过这场战争可以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使伊拉克民主化。这个动机并没有不妥，然而他采用的手段并不恰当。他只是用军事手段消灭了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政府，却并没有促进伊拉克的民主化或者重建伊拉克。当时有很多文件都向布什指出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远非简单，但小布什对此置之不理。

萨达姆下台后的权力真空和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管理不善导致什叶派和逊尼派

之间广泛的内战，以及针对联军的长期叛乱。美国军队于2011年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才完成了撤军。长期的叛乱反而加强了伊拉克的“基地”组织，使其最终演变为伊斯兰国家。因此，伊拉克战争是个伦理失败的案例。

国家元首们若面临战争中的道德困境，很难避免脏手问题。但如果面临的不是生死存亡的道德困境，却还是把国家利益，比如经济利益，置于他国的人权之上，那就是不能接受的。

奈将14名二战后的美国总统根据意图、手段和后果这三个维度评判后进行了排序，排在最前面的四位总统是：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老布什。排在最后面的四位是约翰逊，尼克松，小布什和特朗普。虽然对于特朗普的判断还只是暂时性的。

## “囚犯困境”

### 迭代游戏给外交政策的启示

“囚犯困境”游戏的核心场景是这样的：犯罪团伙的两名成员被捕入狱，被单独监禁。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判定他们的罪名，便打算判处两人各一年监禁。同时，警察也希望通过他们的口供寻到更多的证据，因此给两人几个可能性：

- 双方都选择保持沉默，那么每人都被判一年徒刑；
- 双方都出卖对方，那么每人都将被判处

两年徒刑；

- 一方出卖另一方，另一方却保持沉默。出卖者将被无罪释放，保持沉默者将被判三年徒刑。

从整体上看，最优方案是双方都不出卖对方，共服刑两年。最糟方案是双方都出卖对方，共服刑四年。中间方案是只有一方出卖另一方，共服刑三年。对于个人而言，

出卖对方的最好结果是得到释放，最坏结果是被判两年。保持沉默的最好结果是被判一年，最坏结果是被判三年。假定这两个囚徒之间并没有多少交情，而且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共同作案被抓，那么从理性和自利的角度看，他们往往会选择出卖对方。

政治学家Roberg Axelrod 对“囚犯困境”游戏进行了升级实验，要求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士参与这个游戏，并且和同一个玩家反复玩这个游戏，即迭代游戏。

他发现反复玩的人的策略和只玩一次的很不一样。迭代起始时，双方都并没有最佳策略，各自的策略都取决于对手的策略。随着迭代的继续，大家可以尝试不同的策略，但最好的策略是以牙还牙 (Tit for Tat)，即你对我仁，我就对你不仁。你和我合作，我也和你合作。时间一久，玩家们发现，如果选择合作，长期效果更优。

“囚犯困境”的迭代游戏实验还总结出一系列成功战略应满足的条件，比如：

- 1) 永远不要成为第一个不合作的人；
- 2) 必须从对手的行动中学习。但为了不至于陷入无休止的相互出卖的循环中，反击要缓和，既要防止被对方利用，又要防止自身的过激报复行为；
- 3) 不要因为对方偶然的出卖而选择频繁地出卖对方；
- 4) 不要让对方捉摸不透我方策略的规律性和相对透明度，从而把我方的策略当作随机策略对待；
- 5) 如果你想和对手合作，就要确保和对方

再次玩同一个游戏的频率足够高。

这个游戏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果一个玩家把对方的合作行为误解为出卖，那么就会错误地选择出卖对方，从而把对方也卷入出卖的循环里，尽管双方原本的出发点都以合作为导向。在政治外交场合，这种误解并不少见。为了避免进入一个对双方都有害的恶性循环，最好通过在随机的重复次数后自发地进行单方合作来补救。

外交政策如同“囚徒困境”迭代游戏，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对抗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迭代的。

历史对什么是有道德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实例。美国的开国总统们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建立合作和联盟，达到长期的互惠效果。到了特朗普这届却拒绝了威尔逊主义遗产中的民主干预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把外交政策当作一次性的交易。

1945年之后的美国秩序既不是全球性的，也不总是非常自由的。美国霸权将世界上半以上的国家排除在外。分析家们认为，随着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被阻断。未来的美国总统将不得不对外交政策做出道德上的选择。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要学会从长计议。里根的国务卿舒尔茨 (George Shultz) 曾说，我们不能把外交政策看作是集市上的一单子买卖交易，而应把它当作一个花园来护理，随时剪枝和清除杂草，使花园长久茂盛。

## 结束语

---

奈通过本书的分析和案例向世人宣告，认为道德不能左右总统的外交决策是非常盲目的，盲目得就像认为明天太阳不会升起一样。既然道德观会影响外交政策，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今后的外交决策过程中更加关注长远的国家利益，关注合作和建立互信关系。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引导大家朝着这个方向迈开第一步。

19世纪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曾说：“美国的伟大不在于比其他国家更开明，而在于这个国家的纠错能力”。今日的美国仍拥有像奈这样优秀的学者基于科学研究的良言和监督，希望这个国家继续保持纠错能力。